

白居易集箋校  
一



伊  
樂  
天



白居易像

據《南薰殿聖賢畫冊》

HA I 49/03



洛陽龍門香山白居易墓

滅後傳示末法徧令衆生  
開悟斯義無令天魔得其  
方便保持霞護成無上道

香山白居易書

勗

許王反

沼

洪音

圻

日格反

蛟

徒音

寤

徒音

薄

符音

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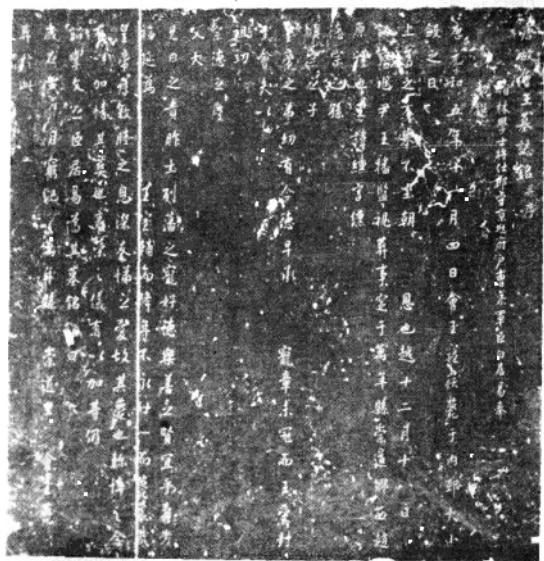
符音

媯

辭音



廣慶元年朝後三日重裝于寶易樓題



白居易撰《唐故會王墓誌銘》

白氏文集卷第八

長慶三年七月

自杭州

又出守杭州

路次藍溪

作

太原男子自願庸且鄙老逢不文田字流拔出泥洋既居可言地  
 願助朝庭理伏閭三上章勸恩不備日聖人存大體優貸容不  
 死風詔傳令又自除刺史官懷齊宦底守天安願隨行止我自  
 得此心于茲十年矣餘杭乃名郡郭郭臨江江已想海門山朝翠  
 來入耳昔子貞九未歸於曾遊此甚覺寬太守曾亦謂魚酒美因  
 生江海興每羨滄浪水尚擬拂衣行況今兼程往去月山峯懸擬  
 白日烟塵起東道既不通改轍從南相自奉窮楚越浩蕩五千  
 里聞有賢主人而多好山水是行頗為極所歷良可紀來馬度  
 藍溪勝遊從此始

初出城留別

朝從紫禁下歸暮出青門去勿言城東陌便是江中路揚鞭放車

文集卷第三十三

金澤文庫

書目誌三

卷三

九十八道

太原府志

冊朝之船可任文

冊迴船可任加死文

淳俊從右丞授禮部尚書辭放從工部侍郎交內

部侍郎丁公著從給事

中校工部侍郎二人所副

太師誅伐備制其文固練仗富道兵馬留後東侍

亦之易也

## 前 言

在我國文學史上，唐詩是封建社會詩歌發展的高峯。這一時期產生了許多偉大的詩人，李白、杜甫以後，白居易就是其中最傑出一個。他的作品，不僅是我國優秀的文學遺產，也是世界文學的寶貴財富。

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字樂天，晚年自號香山居士。太原是他的郡望，所以白居易有時自稱太原人；從他曾祖白溫開始遷居到下邽（今陝西省渭南縣），實際上是下邽人。他的祖父白鏗、外祖父陳澗都是詩人，父親白季庚也是明經出身，做過許多任地方官，很有政績。白居易生長在這樣一個以文學著稱的小官僚家庭中，從幼年起就受到良好的文學教養，為他後來的詩歌創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唐王朝自安、史亂後，中央政權日漸削弱，藩鎮擁兵割據，對抗朝廷。宦官掌握禁軍（神策軍）大權，專橫貪暴，無惡不作，皇帝的廢立，多半出于其手。再加上封建官僚之間劇烈的派系鬥爭（著名的如牛僧孺和李德裕的黨爭），政治異常黑暗。統治階級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更加緊對人民的慘酷剝削，土地愈益集中，生產力被嚴重破壞，階級矛盾更尖銳化。就在這樣的時代裏，詩人白居易度過了他的一生。他十幾歲時，由于朱泚、李希烈等作亂，曾到徐州、越中等處避難。年紀稍長，父親白季庚去世，家境衰落，生活更加貧困，迫使他南北奔走，愁于衣食，「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飢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月有感聊書所懷寄上浮梁大兄於潛七兄烏江十五兄兼示符離及下邳弟妹），「苦乏衣食資，遠爲江海遊。光陰坐遲暮，鄉國行阻修。身病向鄱陽，家貧寄徐州」（將之饒州江浦夜泊），在這些詩句中，蘊藏着詩人的無限辛酸，也表現出詩人對於當時人民生活痛苦有着深切的感受，因而與遭受苦難的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有共通之處，奠定了他以後在政治上和詩歌創作上關懷人民疾苦的思想基礎。

貞元十六年（八〇〇）二月，在中書舍人高郢的主試下，白居易考取第四名進士。貞元十八年（八〇二）冬天，白居易應吏部試，第二年春天與元稹以書判拔萃同登科，同授秘書省校書郎，兩人成了最親密的朋友。校書郎任期滿後，白居易又與元稹一起應制舉，他們在長安華陽觀閉戶累月，寫出了策林七十五道，表達了革新政治的進步見解，最早提出了詩歌以反映人民疾苦和補察時政爲職責的現實

主義理論。制舉登科後，白居易被任命爲盩厔縣尉，他更多地了解人民被重重賦稅殘酷剝削的慘狀，寫了很多揭露封建統治者和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如觀刈麥、宿紫閣山北村等詩。同時他也爲自己擔任皇帝的差科頭（縣尉）而感到十分痛苦，「臣近爲畿尉，曾領和籩之司，親自鞭打，所不忍視」（論和籩狀），就是這種矛盾心情的真實寫照。他的爲人傳誦的名篇長恨歌也是在這一時期寫成的。

元和二年（八〇七）秋天，白居易被召回長安，自集賢校理充翰林學士。第二年四月改授左拾遺，仍充翰林學士。中唐以後的翰林學士是替皇帝草擬機要文件的差使，地位非常重要，後來的宰相多半由其中提拔，所以又稱「內相」。左拾遺是諫官。白居易在任諫官的三年中，屢次上奏章請革除弊政，勇于向腐朽的惡勢力作鬥爭，得罪了宦官與以李吉甫爲代表和宦官相勾結的舊官僚集團，他爲了反對宦官吐突承璀做統帥，甚至當面指摘了皇帝，因此爲宦官和舊官僚集團所切齒痛恨。但詩人並不顧忌這些，他除了上書爲民請命之外，還以他的詩歌作爲政治鬥爭的武器，他的「惟歌生民病」的輝煌組詩 秦中吟和新樂府就是這一時期所創作的。

元和九年（八一四）冬，白居易任太子左贊善大夫。第二年（八一五）六月，宰相武元衡被刺身死，御史中丞裴度受傷，白居易上書奏論，主張捕賊雪恥，引起了宦官和舊官僚集團的不滿，以越職言事之罪貶爲江州司馬。在江州時期，他寫成了與長恨歌齊名的不朽之作琵琶行和詩歌理論名篇與元九書。直到他的好友崔羣出任宰相，白居易才于元和十三年底由江州司馬除授忠州刺史。

貶官和遠離京都的寂寞生活，使白居易的精神非常苦悶，壯志逐漸消磨。元和十五年（八二〇）正月，憲宗暴卒，穆宗即位。這年夏天，白居易被召回長安任尚書司門員外郎（二），接着又改授主客郎中、知制誥。但是重返京城，並沒有給白居易帶來歡樂，君王昏庸，朝政日非，權貴們互相傾軋，使他感到「宦途氣味已諳盡」，不願卷入毫無意義的黨爭，便請求外任。長慶二年（八二二）七月，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在杭州以及以後任蘇州刺史期間，白居易在自己職責範圍內實現了「恤隱安疲民」（初下漢江舟中寄寄兩省給舍）的願望，他興修水利，引湖水灌田，替人民做了很多好事，深受蘇、杭人民的愛戴。他罷杭州刺史時所作別州民詩，傾吐了詩人對人民的深厚感情：「稅重多貧戶，農飢足旱田。唯留一湖水，與汝救凶年。」

仕官的不得意，清閑的生活，使白居易更能致力於詩歌創作，不論是在長安任職或是任外官期間，他和朋友們的唱和是十分頻繁的。他一生中結識了很多朋友，大多是當時著名的詩人、文學家、政治家，如韓愈、張籍、王建、楊巨源、徐凝、李紳、牛僧孺、杜元穎、錢徽、嚴休復、裴度、韋處厚、崔羣、楊虞卿、楊嗣復、令狐楚、賈餗、舒元興、郭行餘、李建、元宗簡、崔玄亮、李宗閔、李諒、沈傳師等。他與牛僧孺、李德裕兩黨的人物都有友誼關係，雖和牛黨關係較密切，但並沒有捲入黨爭中去。早在任盩厔尉時，就結識了著名的唐傳奇作家陳鴻，鴻爲他寫了長恨歌傳，成爲與長恨歌並傳不可分割的共同體。元稹是白居易早年往來最親密的朋友，歷來有元、白之稱，而白居易晚年關係最密切的朋友是劉禹錫，

又被稱爲劉、白。寶曆二年（八二六）初冬，白居易離蘇州回洛陽，途中與劉禹錫在揚州見面時有醉贈劉二十八使君詩，劉禹錫也有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詩，詩中表現了兩人極其深摯的友誼。但實際上劉、白兩人在揚州並非初次見面，劉禹錫有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詩，約作于元和三年至六年間，可知他們這時已有往來。又據元稹元和十年春在藍橋驛所作留呈夢得子厚致用詩，則劉禹錫自朗州召回與元稹同返長安，必有與白居易見面的可能。白居易另有一首初見劉二十八郎中有感詩，作于大和五年冬，見那波道圓本白居易集卷五七，編在醉贈劉二十八使君詩之後，題中也稱爲「初見」，這裏「初逢」和「初見」都是久別初逢的意思，並非專指初次見面。又從白居易永貞元年所作爲人上宰相（韋執誼）書、寄隱者詩，以及在論承璫職名狀中攻擊策劃永貞事變的宦官集團首領俱文珍一事，足以證明他是永貞革新政治集團的同情者，在這一點上，與積極參與永貞革新的劉禹錫有着共通的思想感情，也許是他們兩人晚年成爲密友的原因之一。

白居易罷任蘇州刺史回洛陽後，不久又由于宰相裴度和韋處厚的推薦，相繼出任祕書監及刑部侍郎。但他至長安任職後，黨爭愈演愈烈，宦途更加險惡，使這位從來不與宦官妥協的詩人深感「人間禍福實難料，世上風波老不禁，萬一差池似前事，又應追悔不抽簪」（戊申歲暮詠懷三首之三），他對實現「兼濟」不再存在任何幻想，便下決心于大和三年春辭去刑部侍郎，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的名義回到洛陽。以後又做了一任河南尹，最後的官職是太子少傅分司東都，會昌元年春以百日長告假滿而停職。

到了會昌二年才以刑部尚書致仕，領取半俸（三）。此時他已「我心與世兩相忘，時事雖聞如不聞」（詔下），實際上他是不能真的「與世相忘」的，就在這樣極端苦悶的心情中度過了他寂寞的晚年。會昌六年（八四六）八月，這位偉大的詩人離開了人間，葬于洛陽龍門山。

白居易的詩歌，由於具有較高的思想性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當時不論在國內和國外都廣為流傳（三）。據說雞林國的宰相搜求白居易的詩歌，竟以一百金換一篇。日本平安朝詩歌發展，也是受到白居易的直接影響。今天，白居易已成為世界上的著名詩人之一，他的詩歌已被翻譯成多種外文，在各國人民中間享有盛譽。他的不朽作品和詩歌創作理論，無論在世界文學史中或中國文學發展史上都留下光輝燦爛的一頁。

## 二

白居易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毫無疑問，反映現實的詩歌是他全部作品中的主流和傑出的部份，可是只談這些却不能概括他的作品的全貌。他的詩歌流傳到現在約有近三千首之多，從創作數量來說，在唐代詩人中是首屈一指的，其中包含「諷諭」詩和「閑適」詩兩大部份。

白居易的思想是儒、道、佛三家的混合產物，他中年曾感於道家的丹藥，後來又皈依於佛教（四），雖然各個時期的表現不同，但「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家思想在他身上始終佔主導地位。

他自己解釋說：「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與元九書）他早期作品中「志在兼濟」的諷諭詩是主要的一面，後期作品中「行在獨善」的閑適詩佔主要的一面，當然他前期也寫有閑適詩，後期也寫有近于諷諭的詩，但對當時所起的作用不大，僅居次要地位。

盛唐是唐代詩歌的黃金時代，但天寶以後逐漸出現程式化的傾向，「詩到元和體變新」（餘思未盡加爲六韻重寄微之），至白居易、元稹時代，才又突破樊籬，形成大變。白居易雖然吸收了如陶潛、韋應物等的所謂「閑適」的一面，另外又繼承了如陳子昂、杜甫等旨在「諷諭」的一面，但他並不是純粹蹈襲前人的老路，確實能做到能變能新，開創了所謂「元和體」，使當時的詩壇繼承盛唐而再盛，出現了又一個新的局面。

如前所述，白居易的詩歌成就，是和他的生活經歷以及他生活着的那個時代分不開的。他的詩歌創作是他的文學理論的實踐，「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與元九書），他主張用這個尺度去衡量歷來的詩人和作品，并總結了自詩經以來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經驗，強調了詩歌的戰鬥作用，內容與形式的統一，認爲文學必須爲政治服務，必須爲現實而作，用來「補察時政」、「洩導人情」（與元九書），使它成爲一種改造社會的工具和武器，決不能爲藝術而藝術。他對於六朝梁、陳以來「嘲風雪，弄花草」，脫離現實的形式主義詩風給予嚴厲的批判，把詩經、漢魏樂府民歌、陳子昂、杜甫的現實主義優良傳統提到正宗的地位，其中特別推崇杜甫，對於他的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等詩篇

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詩句，則大為贊揚。「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新製布裘），他早年從民間剛登上政治舞臺不久，就發揚儒家「兼濟」的精神，要求實行「仁政」，不畏強暴，寫成了秦中吟、新樂府和其他「諷諭詩」的名篇，如諷刺橫征急斂、貪污強暴的重賦、杜陵叟、黑潭龍、賣炭翁、宿紫閣山北村等。他極端沈痛地傾吐了鬱積人民心中的憤怒道：「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重賦）又運用同樣的手法控訴了封建統治者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將它比喻成了吃人的野獸：「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鈎爪鋸牙食人肉！」（杜陵叟）宿紫閣山北村詩寫神策軍人的強暴，賣炭翁寫宮市「白望」的擾民，都非常形象化，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又如「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輕肥）、「朱門車馬客，紅燭歌舞樓，歡酣促密坐，醉暖脫重裘」（歌舞）、「豈知閹鄉獄，中有凍死囚」（歌舞），把豪門貴族荒淫無恥的生活，和江南大旱人食人、閹鄉農民欠賦被囚凍死的慘狀，作了鮮明的對比，藝術感染力非常強烈。此外又如反對窮兵黷武的侵略戰爭的新豐折臂翁，反映封建社會婦女受迫害的上陽白髮人、陵園妾、母別子、讖婚、井底引銀瓶等，勸戒奢侈浪費的紅線毯、牡丹芳、買花等都是他的傑出的現實主義名篇。總之，他運用了變化萬端的比興手法，塑造了各種生動真實的受迫害者的藝術形象，揭露和抨擊了封建統治者的暴政和不合理現象，都是他的詩歌創作的輝煌成就。當然，白居易的文學理論也有其一定的片面性，過份強調單純的政治標準，與他的創作實踐有矛盾之處，也是無可諱言的。

白居易詩歌的藝術特點是「用語流便」(一)，平易近人。他善於學習和運用民間語言入詩，音韻優美，便於歌誦，容易爲廣大的讀者所接受，因此當時「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元稹白氏長慶集序)。但他對民間文學和民間口語絕非死板的摹仿，而是經過很大程度的加工和提煉，「鄙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棄刀尺」(劉禹錫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他的作品，明朗、自然、圓熟、新鮮，必需千錘百煉才能達到這樣的藝術境界。宋周必大曾經說：「香山詩語平易，文體清駛，疑若信手而成者。閑觀遺稿，則竄定甚多。」(省齋文稿卷十六跋宋景文唐史稿)可見他下筆的極端謹慎了。至於蘇軾所提出的「元輕白俗」的說法，造成後世對白居易寫作「容易、輕率」的誤解，則是非常片面的。此外，僧惠洪冷齋夜話中所傳白居易詩成後「老嫗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則更是出於有意的譏誚，令人不能置信。由於白居易的詩歌具有這種質樸明直的风格，因此直到晚年，他還認爲像劉禹錫的「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一些寓憤激于婉約的詩句爲自己所不及，其實白居易那種具有強烈正義感、不畏強暴的風格是很難「婉約」的，所謂缺點也正是他的優點。

除了「惟歌生民病」的諷諭詩以外，白居易還寫了大量的感傷詩和雜律詩。雜律詩中如寫湖山之美在景中寓情的錢塘湖春行，以白描手法見長的問劉十九，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他的絕句，好作眼前景語，風韻天成，後來發展到首創憶江南小令，又與劉禹錫唱和楊柳枝、浪淘沙，吸取當時的民歌，譜



寫新聲，在詞（長短句）的發生和發展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感傷詩中的長篇敘事詩，長恨歌、琵琶行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代表作，這兩詩情節曲折，描寫細緻，抒情氣氛濃厚，句律和諧流動，後者的成就尤其超過前者，這和元稹的連昌宮詞、夢遊春七十韻都是「元和體」的上乘之作，「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唐宣宗弔白居易詩），白詩不但在當時爲人所傳誦，對後世的影響也極深遠。如隋初吳偉業永和宮詞、圓圓曲，以及近代王闈運圓明園詞等，都是它的仿製者。此外，後世的許多著名戲劇如關漢卿唐明皇哭香奩（殘本），白樸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牆頭馬上，屠隆的彩毫記，洪昇的長生殿，馬致遠的青衫淚和蔣士銓的四弦秋等，都是由白居易的作品演變而成的。所以白居易的詩歌創作，非但影響了他同時代的詩人元稹、劉禹錫、李紳、張籍、王建、楊巨源等人，而且對宋代及宋代以後的著名詩人如王禹偁、梅堯臣、蘇軾、黃庭堅、陸游、楊萬里、袁宏道、吳偉業、袁枚、趙翼、王闈運、黃遵憲等，也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他被後人稱爲「廣大教化主」（張爲詩人主客圖序），絕非過譽之辭。

白居易晚年退隱洛陽，寫了不少閑適詩，其中很多是消極頹廢、自我陶醉的作品，主要是怕捲入黨爭的漩渦，企圖全身遠害，儒家「獨善其身」和佛家「求無生，歸空門」、道家「知足不辱」等思想在他身上佔了上風，其中一些不健康的作品，今天當然是要認真加以批判對待的。可是白居易這時內心裏是充滿着錯綜複雜的矛盾的，他的一些閑適詩並未完全忘情現實，「可惜濟時心力在，放教臨水復登山」（春來頻與李二賓客郭外同遊因贈長句），就是他晚年這種矛盾心情真實的寫照。有一次他在沐浴之後，感